

10月28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新书《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发布会在清华大学邮架轩阅读体验馆书店举行。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传统文化研究及其背后的人和事成为现场的焦点话题。40年前,陈来先生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研究生,从此开启其哲学研究生涯。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这本《守望传统的价值》通过访谈等形式,生动展现了陈来先生20年间对传统文化的不懈探索,以及改革开放40年来传统文化研究的态势。

与会嘉宾、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先生如此评价:“陈来先生不仅做传统文化的专业研究,比如大家熟悉的朱熹、王阳明研究,而且在海外儒学研究方面,在学界都具有典范意义。对于中华书局来说,陈先生这本新著还有另外一重价值,那就是在4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各种思潮激荡的过程中,陈来先生从来都没有缺席。他针对社会上很多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现象表达的意见,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陈先生在文化方面对社会大众做出的重要贡献”。

本报根据现场发言,摘编陈来先生回忆早年从冯友兰、张岱年两位先生的内容,以飨读者。

陈来:给冯友兰先生当助手琐忆



1986年夏天,陈来(右)在冯友兰先生家中

谈到我的学术经历,大家都知道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期间是师从张岱年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实际上,冯先生长张先生十几岁,从学术地位上讲,也是应该冯先生放在前面。为什么我倒过来,把张先生放在在前头,冯先生放在在后头?那是因为按我的学业来讲,我的导师是张先生。1985年我博士毕业以后,系里就安排我给冯先生当助手,系里安排是一年,这一年算我的工作。一年结束以后,冯先生说:“你还是接着给我做助手吧”。我说:“行”。我就一直做到1990年冯先生去世。助手虽然是给他帮忙,但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向老先生学习的过程,我要感恩,不能忘记这段学习时光。

我总是讲,我师从张先生和冯先生。因为我给冯先生做助手这几年,在各方面学到了很多。像中国哲学的解读、诠释,这些最基本的技术方法,都是张先生教的,我也自觉按照张先生的治学方法去做,但进一步提升治学的眼界、胸怀,以及看问题的高度,这个不是在课堂上能学到的,这是我给冯先生做助手这几年学到的新东西。

我这个助手体力方面的付出不大(笑),冯先生有三级助手,最直接的(第一级)助手住在他家里,是一位来自辽宁的哲学爱好者。因为除了宗璞先生负责冯先生生活上的事情之外,还需要有个人在旁边照顾。这位生活上的助手给冯先生念报、念资料,写作时,冯先生口述,他就负责记录。我1985年见到冯先生的时候,他看书看得很近才能看见,到1987年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他不可能自己动手来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我去的时候,《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到第4册(全7册),他说你就先看第四册的稿子吧。我看完以后,等下次去就跟他谈我对这稿子的意见,特别是前一部分王弼

和玄学总论的部分。

我现在已经忘了具体是怎么表达的,关于“有无之辨”,冯先生就接受了我的意见,认为我谈的是对的。他跟宗璞说,“陈来到底是个博士”。当然这有点自夸。宗璞先生后来又跟我说了这句话,我也很受鼓舞。有一天,我骑车经过燕南园一个小坡时,正巧碰上张岱年先生从三松堂出来,就赶紧下车,当时,张先生也重复了这句话,说冯先生表扬你了,张先生也觉得很高兴。

我去冯先生家是不敲门的,主要是敲了他也听不见(笑)。三松堂进去以后,这边是大客厅,客厅里头还套着房间,然后有个走廊到头,再进去那间房子才是冯先生的书房,所以我要去敲他那个纱门,他也听不见。我拉开纱门直接进去,落座,他的助手就说“陈来先生来了”。完了冯先生就带着河南口音说:“陈来来来了。”才讲到的第一级助手就负责所有事务性的工作,主要负责记录。后来有所调整,读报请了一位姓马的老先生,声若洪钟,是清华胡显章教授的岳父。胡显章老师以前是我们清华党委副书记兼人文学院院长,长期负责清华文科工作。不知怎么就找到这位马先生给冯先生读报。马先生好像唱过京戏,读起报来就像老生念白一样,很好听。马先生看起来六七十岁的样子,应该是已经退休了。下午,那位生活助手就继续抄写。

1988年,我请冯先生给我命字。冯先生说“好”。过了大约两个月以后,冯先生的助手跟我说:“老先生都给你写好了,写得很好。”他拿出两页半很薄的400字稿纸,上面还印着“北京电车公司印制”。冯先生给我命的字是“又新”,典出《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往来”在《周易》里是一对哲学概念,“往者不可追,来

者犹可待”,“来”字概括地讲就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冯先生认为,以“来”字为名者,应以“又新”为字。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冯先生当时是用古文来写的。古代是有命字的传统,我们看古代儒学大师的文集,有很多的字序、字说,即给人命字来写成一篇文章。冯先生对传统很熟悉,我觉得这篇《为陈来博士命名》为又新说》是冯先生晚年难得的古文文字。

冯先生对古文是下过功夫的。冯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讲古文,关于如何把魏晋和唐宋古文结合,他有一个说法:“追求寓六朝之偏于唐宋之古文”。冯先生写过的比较有名的古文,一篇是《西南联大纪念碑文》,那是20世纪的经典。还有一篇是《祭母文》,非常的真性情。1949年以后,大家都弃旧从新,不再用文言文,但冯先生仍然可以信手写出来。

《为陈来博士命名》为又新说》后来印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三松堂文集》里,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

少了三百多字。现在中华书局又有了《三松堂文集》新印本,相信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冯先生1990年冬天去世以后,我和宗璞先生说,打算另外誊写这篇文章。当初,冯先生是用原子笔写的,因为写起来滑溜,而且是写在稿纸上,不能存之久远。我打算请书法家用小楷写出来,盖上冯先生的章,但是一直也不认识什么书法家。

直到2010年左右,我有一个学生在杭州工作,她找到了浙江博物馆一位善写小楷的副馆长,终于完成了这一夙愿。这次,我在文后面加了一段话,讲这篇文章的缘起。2013年,我到浙江开会,有位研究阳明的学者送我他出版的字帖,我请他重新再写了一遍《为陈来博士命名》为又新说》。后来我把重抄的文章拿到宗璞先生那里去,宗璞先生拿出冯先生的两枚印章,给我盖上了,那印章是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给冯先生刻的,1949年以后已经很少用了。我把这幅盖章的挂在我清华的办公室里,没盖的那幅就挂在家里头。后来,我把这段文

字发到博客上(我的博客阅读量不高,一个月也就一百多人看),有人把这篇文字发在微信上,就传播开了。有一次碰到一个年辈比我长的先生,说没听说过这事,他问我,你的字也没见你用过啊。其实,字是别人称呼你的,不能自己称呼。这说明即使年辈比我长的先生,都不知道字是怎么用的了。

以前我看庞朴先生的回忆录,讲他认识张岱年先生的时候,就提到以前人们的一些老礼儿。那时候庞朴先生住在语言大学(过去地质学院),庞朴先生去看望张先生,张先生过几天回访,临走的时候,张先生就问庞朴先生有没有字,有字以后就用字来称呼。冯先生和张先生的关系就是这样。从亲戚的角度,张先生应该叫冯先生六哥,因为张先生夫人是冯先生的亲表妹,见冯先生叫六哥,但张先生就叫冯先生,冯先生叫张先生“季同”(张先生字)。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有关我的师从经历,以及治学方法,我在这本书(《守望传统的价值》)中也有所涉及。我刚才讲的是师从冯先生的一些经历,就是这样一段密切的关系。在学术上,冯先生对我也是肯定的。肯定在什么地方呢?冯先生晚年出的几本书,每次写自序,都要写谁谁谁给我看稿子,最后说一句:“陈来同志提了重要意见。”其实我也没提多少。提到的主要是现代的部分,比如熊十力,冯先生就提出了一些批评的意见。我觉得,批评意见以前已经有过了,再提就要有新意。我和冯先生说,“您再提点新的意见”,我下次再去,冯先生就又有新的意见了。其实,不是我提的哪几条被冯先生吸收了,而是他会因此再进一步提升书中的细节。

冯先生全集在中华书局出版,很高兴听到张先生的集子也是由

中华书局来出。这让我想到收藏意识很重要。2002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我收藏了一册东西,您能不能帮我看是不是张先生的?”这位收藏者拿来了两本书稿,我一看字迹就知道是张岱年先生的。两秒钟看完,我就还给他了,怕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这是张先生上世纪40年代写的阐述自己哲学体系的著作。张先生这部书稿原本没有名字,后来张先生接受了我提的书名,因为冯先生其间写了《贞元六书》,我就建议这本书叫做《天人五论》。

40年代,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三校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当时北大、清华的政策是,教授去学校出路费,教授以下不给出路费,不出路费也可以自己去。因为师母身体不好,所以张先生没能去成南方。张先生虽然留在北京,但为了保持气节,他没有去伪北大,而是在私立大学教书。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接收北大时,曾在伪北大任职的老师一律开除,这其中也有学问很好的老师,专门写文章表示不满。傅先生很强硬,说要是胡(适)先生来就手软了,必须一刀切。张先生当时在(私立)中国大学教书,介绍他去的是王蒙的父亲王锦第。

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是在中国大学油印成册作为讲义,1948年交给商务印书馆付铅印,但没有出版。直到“反右”结束以后才出版,用的笔名“宇同”。

改革开放以后,王蒙当了文化部长去冯先生家,跟老先生聊得很高兴。走了以后,冯先生说:“王锦第有子矣”,冯先生就又有新的意见了。其实,不是我提的哪几条被冯先生吸收了,而是他会因此再进一步提升书中的细节。

《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陈来著,中华书局2018年9月出版

谢冰莹漂泊上海记

■陈 虹

谢冰莹(1906—2000),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位女兵作家,早年与陈天华、成仿吾并誉(湖南)新化“三才子”。她作为经受过北伐战火洗礼的女兵,成名作《从军日记》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陆续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深得主编孙伏园及林语堂的鼓励和赏识。

北伐革命失败,女生队解散,女兵生活戛然而止,回湘所遇极度失望,1928年,不甘沉沦、追求自由的谢冰莹决意离开湖南,取道汉口乘船往上海。初到上海举目无亲,兜里仅剩一元多钱,好在得到孙伏园热情欢迎。不过,10天后的一个早晨,当地铺开稿纸欲续写那篇未完成的《血痕》时,几个巡捕冲进她租住的房间,不由分说将她拘捕。谢冰莹如堕云雾,不知祸从何降,在黑暗、潮湿的牢房度过了3天既不给饭吃,也不提审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日子。后来,经孙伏园营救方获保释,原来起因是她不明就里住进了绑匪家,房东事发,她不幸牵连,差点拉进大案。这次遭难,使她失掉了行李、书籍和几篇呕心沥血撰写的文稿。此后,囊空如洗,忍饥挨饿衣衫褴褛,只得靠以鬻文为生,作品散见于当时的《时事新报》和《申报》副刊。

忽然有一天,在上海亭子间过着清苦生活的谢冰莹,从翻译家汪德耀手里接到一封由法国寄来的信,从罗马到满篇是法文,原来是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发来的信,大意是:“……从汪德耀先生译的《从军日记》里面,我认识了你,年轻而勇敢的中国朋友,你是一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你虽然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鸟,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冲出云团,翱翔于

太空之上的。朋友,记着,不要悲哀,不要消沉,不要失望,人类终究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的。”

1928年秋,在一次作家聚会上,谢冰莹结识了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及张平平等,此后不几日,她出于“想多知道一些作家写作的经验,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及写作环境,我终于一个人鼓着勇气去拜访郁达夫先生”,在法租界赫德路(今常德路)郁达夫寓所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边交谈边饮酒甚是投缘。那段时期,孙伏园办了一个综合性刊物《贡献月刊》,社址就在他家,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寒烟”书屋,谢冰莹常常在周末去探访,告别时总会带走几本刚问世的文艺刊物。孙伏园出于对谢冰莹文学才能的怜惜,建议她考大学,愿意亲自出面去交涉,以使她免交学费,且由他承担膳费和书费。但素来主张自食其力,不愿依赖家庭或朋友的谢冰莹,却打算先解决生计问题,即使当工人、保姆也成,等到有积蓄后再深造。就在她为找工作陷入苦闷而徘徊时,得知此事的钱杏村(阿英)关心道:“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费,可以靠卖点文章来补助它。”

由于阿英的介绍,她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借宿霞露路(今淮海中路)1014弄,同时入学的还有她中学时好友王克勤,即后来一度成为电影明星的王莹。因经济困顿最终不得不抛弃自己亲生女婴的悲苦。笔下描述着世态炎凉,呈现着“夜的上海,中国的巴黎,一到电灯辉煌的时候是多么热闹,在黑夜中愈显得上海的富丽,上海的繁华,上海的伟大,以及上海

永远忘不了那段忍饥受冻的生活。”最窘迫时,她竟然连续4天无食可进,连喝一杯开水的钱都没有,饿得实在熬不住,便找约定出版《从军日记》的春潮书店夏康农借钱。《从军日记》出版那天,她快乐极了,只见“春潮书店的大门口贴着一张用不同颜色写的鲜明又动人的广告”,书的封面上印着丰子恺女儿画的小兵骑马,但是,饥肠辘辘催着她赶紧向书店索要那应得的几元版税款,聊以果腹及支付账目。

谢冰莹就读的上海艺大因学潮招致当局的粗暴干预,两年前曾被解散过的学校再次封闭,她原本怀揣至少能安然读两年书的愿望,结果不到半年就破灭了。1929年春,正愁着出路,收到一封由孙伏园代转的三哥信,里面附有一张30元汇票,劝其去北平投考女师大,她虽然有些犹豫,觉得“上海在当时,的确是文人荟萃的地方,也是文人们快活的摇篮”,但在亲情召唤和孙伏园劝慰下,于5月30日启程,登上了开往天津的海船。

历经种种磨难,谢冰莹在1931年再度辗转来到上海。仲夏,她置身江湾幽静的小黑房子里,不停地构思小说里的人物,废寝忘食地写作。谢冰莹文学创作始终充满呼唤女性觉醒、抗争、自立的精神。《抛弃》是一篇以1931年春上海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位外来女工因经济困顿最终不得不抛弃自己亲生女婴的悲苦。笔下描述着世态炎凉,呈现着“夜的上海,中国的巴黎,一到电灯辉煌的时候是多么热闹,在黑夜中愈显得上海的富丽,上海的繁华,上海的伟大,以及上海

的罪恶”之强烈对比,小说在刻画人物命运的同时还提及到上海的一些具体地名。文思敏捷,焚膏继晷,天资加勤奋的她居然一天能写13000字,仅用了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青年王国》和《青年书信》两部书稿。《青年王国》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物是我从教过的学生里面挑出来的,把好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几个人的缺点,加到王国材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这样,我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不吃饭,不睡觉。有时买几个面包放在桌子上,饿了,左手拿着面包啃,右手仍然在写字;晚上,实在写累了,和衣往床上一倒,老鼠成群结队地跑来把面包拖走了也不知道……”这两部书很快顺利出版,使她总共拿到了650元稿费,这在当时可算得上一笔巨款,于是,她决定用这笔钱去日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夙愿。

1931年7月20日,她乘船启程去长崎,不久,“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国耻耻辱令其悲愤不已,入学东京早稻田大学后,即和许多留日学生一起参加爱国抗日活动,与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是年底被遣送回国。1932年1月,经亦师亦友的黄亚子先生撮合,谢冰莹与文人顾凤城开始了过山车般的短暂婚姻,这也是她的第二段婚姻,结婚那天,没有举行仪式,只是在他们的新居办了一桌酒席,去吃喜酒的有柳亚

子、高尔松高尔柏兄弟,沈松泉及光物命运的同时还提及到上海的一些具体地名。文思敏捷,焚膏继晷,天资加勤奋的她居然一天能写13000字,仅用了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青年王国》和《青年书信》两部书稿。《青年王国》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物是我从教过的学生里面挑出来的,把好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几个人的缺点,加到王国材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这样,我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不吃饭,不睡觉。有时买几个面包放在桌子上,饿了,左手拿着面包啃,右手仍然在写字;晚上,实在写累了,和衣往床上一倒,老鼠成群结队地跑来把面包拖走了也不知道……”这两部书很快顺利出版,使她总共拿到了650元稿费,这在当时可算得上一笔巨款,于是,她决定用这笔钱去日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夙愿。

1931年7月20日,她乘船启程去长崎,不久,“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国耻耻辱令其悲愤不已,入学东京早稻田大学后,即和许多留日学生一起参加爱国抗日活动,与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是年底被遣送回国。1932年1月,经亦师亦友的黄亚子先生撮合,谢冰莹与文人顾凤城开始了过山车般的短暂婚姻,这也是她的第二段婚姻,结婚那天,没有举行仪式,只是在他们的新居办了一桌酒席,去吃喜酒的有柳亚

完交他出版,但出于诸种原因,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章节,直到1936年3月才由良友图书公司成书出版,迅即轰动文坛蜚声中外,后被翻译成英、日、法、德、西、葡、意等文字。

1936年夏,二赴日本留学屡遭迫害、逃匿狱的谢冰莹悄悄从东京返回上海,随即取道香港前往桂林。1948年9月,谢冰莹应聘去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任教授,途经上海,临行前特意去钱君匋办的万叶书店购买一批新书,托人带给远在北平的湘儿,从此漂泊海外,浪迹天涯。

笔者据史料梳理,自1928至1948年20年间,谢冰莹前后六到上海,除第一次时间稍长,另几次较短。相比好些著名的现代作家,谢冰莹在上海居住的时间不算多,但首版于上海的著作却相当可观:由春潮书店出版的有《从军日记》(1928年);由北京迁沪的新书局出版的有散文集《青年书信》(1931年)、散文集《湖南的风》(1937年)、散文集《生日》(1946年);由光明书店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前进》(1930年)、散文集《麓山集》(1932年);由上海学生书局出版的有长篇小说《中学生小说》(1930年);由光华书局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血流》(1933年);由中和印刷公司出版的有长篇小说《青年王国》(1931年);还是赶紧回故乡湖南躲避为妥,于是,匆匆告别上海,隐居长沙妙高峰青山祠,但文学创作方面与上海的联系却未断,应当时正在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中国文学丛书的赵家璧之约,闭门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1938年);由上海远东图书馆出版的有日记体散文《在日本狱中》(1940年)。